

人水和谐:水文化的核心价值

余达淮¹, 张文捷², 钱自立¹

(1. 河海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2. 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院, 江西 南昌 330029)

摘要 水文化是体现人水关系的文化。水在和人类文化的共生中具有“道德顾客”身份,因此,人水和谐的关系是一种道德的必然,是水文化最根本的价值。人水和谐应该体现在水祀活动和水利活动两个方面,在活动中应该尊重水作为生命主体的地位。

关键词 人水和谐; 水文化; 水利; 道德顾客; 价值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8)02-0020-03

一、水文化是体现人水关系的文化

格尔夫有句名言:“我们说话的能力肯定是天生的,而我们说英语的能力肯定是文化的。”^[1]套用他的话,我们可以说,离不开水是人的天性,而离不开长江、黄河,则是中国人的文化天性。水是一种自然资源,自身无所谓文化。水一旦与人发生了联系,人们对水有了认识,有了想象,有了感情,有了治水、用水、管水的实践创造,就产生了水文化,所以说,水文化是人水关系的文化,并透过人与水的关系体悟人与人的关系。

像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一样,中国人的文化也是水哺育的。我们习惯说黄河是炎黄子孙的母亲,但是确切地说,是黄河的支流滋养了最早的华夏民族部落。如传说中的炎、黄文化成于姜水、姬水;唐、虞文化在汾水两岸;夏文化在伊水、洛水两岸;商文化历经迁徙,在孟诸泽、蒙泽以及睢水、涣水、滎泽、荷泽、淮水、济水、洹水、淇水一带;周文化在泾、渭、伊、洛、汾、涑等支流旁边^[2]。所谓“泾渭分明”、“清漳不清,浊漳不浊”等,是对水的自然属性的一种地域文化认知;“河龙图发,洛龟书成”是对水的一种超自然属性的神学的形而上给定,而“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智者乐水”(《论语·雍也》)、“上善似水”(《老子·道篇》)等则是人类理性自觉而抽象出来的一种文化气质。

水作为一种文化元素,它甚至影响和构成了先民朴素的世界观。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说过:“大地停在水上”。亚里士多德认为泰勒斯以此来指水是存在着的万物的物质始基,这种以水为本

原的思想或许是亚里士多德的猜测;“泰勒斯是因为温暖、种子、营养及它们所养育或体现的生命全都是水的功效才选择了它。”^[3]

中国阴阳五行哲学中,水列为五行之首,它构成万物更新变化的基本元素。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更多的是取譬于水,隐喻人生,化为智慧。儒家追溯仲尼川上亟称于水的意象,孟子阐释道:“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孟子·离娄下》)这种水为源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在荀子那里进一步升华为文化秩序:“夫水,大畜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不涸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荀子·宥坐》)在道家那里,水与道的本体论意义相通;“上善似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老子·道篇》)“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老子·德篇》)所谓“有静”、“下”,是“道”落实到人生层面的本体意义,是得道之德。而这是从水的自然秉性中体会的。庄子超然逍遥,淳洄汪洋,他也很喜欢拿水说事,他说:“夫水之洳也,无为而才自然矣。”(《庄子·田子方》)他将水之无为扩展到人生层面,则自觉为“君子之交淡若水”(《庄子·山木》)。

佛教自汉代传入之后,建寺塔于山林河海之间,救众生于水深火热之中,其思想虽掺入中国传统理念和民族生活的内容,但也将中国人的山水智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佛教认为,地、水、火、风是构

成世界的四大元素,具有化生万物的功能。水、火变动不居,长有不灭,表明:包括人类在内的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一种流,一切事物都在永恒的流动中存在。^[4]佛教认为“性自天然”,此“天然”在禅宗慧能那里是本心,在三论宗嘉祥那里是一切草木,一切山水。佛教由色(大千世界的物质现象)入禅,启迪了人们的文化心理。李端的《寄庐山真人》:“月明潭色澄空性,夜静猿声证道心”,王维的《过香积寺》:“月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都是用一潭止水的清澈澄明,来契合诗人虚融淡泊的精神世界。凡此种种,说明儒道释的学说中都有水的沉思与觉悟。中国的水文化,就以这些儒道释学说中具体的反映着人水关系以及由水而觉悟的人与人的关系为载体,体现着独特的内容和形式。

二、人水和谐是一种道德的必然

文化意味着价值。无论孔孟从水中体会了时间观和自强不息的人生观,无论老庄体会了谦卑的道德观和无为自敛的精神气质,无论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无论孙子通过水之虚实、水之强弱体会了兵家之道,也无论佛家参悟了无量智慧。然而,架构于人水关系的水文化,其根本价值在于追求人水和谐。

李宗新认为:“自然形态的水是通过审美进入人类精神生活从而获得文化生命的。”^[5]其实,自然形态的水并不都是通过审美进入人类精神生活的。在对水进行审美观照之前,人类还经过了一个痛苦的与水灾害抗争的过程。一部华夏民族史,是一部治水的历史。也就是说,长期以来,人与水的相处并非和谐。水可为利,亦可为害。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古黄河在中国文化发展上有过重要贡献。黄河之为害,是自宋代之后。所言黄河之害者何?天灾者有,但人祸更甚。如:“龙德三年,决河注曹濮以限唐兵。唐同光二年,塞梁决河,既而复坏。五代兵争,梁唐夹河相持,决水行军之事屡次发生。”钱穆先生说,“唐以前,黄河之安流是常态,而溃决为变态。自宋以后,则溃决为常,而安流为变。自宋代河决改道以来,宋人欲以限契丹而不愿河流之北,金人欲以宋为壑而利于河流之南;元明以下,又患运道之塞,而复不欲河道之北趋。河流日失其性,忽南忽北,而河患益甚。又兼明清两代政治之腐败,河工之浪费与黑暗,更益造成黄河为害中国之局面。”^{[6]244-246}。1938年国民党政府为阻止侵华日军南下,而在黄河花园口炸堤,整个黄泛区由西北至东南,长达400余km,流经豫、皖、苏3省44个县,淹没耕地113.3多万hm²,冲毁民宅140万余家,90万人死亡,1200多万难民流离失

所,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河害。

黄河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灾难,从政治层面看是由于政治腐败,没有兴修水利。而从文化层面看,在于没有从价值的角度,认真思考人水之间的关系。古往今来,我们一直在利用水,我们称黄河、长江为母亲河,但我们始终是在索取,而不是把它看成文化的一个共生体,不懂得彼存我存、彼亡我亡。我们知道,文化价值的核心是伦理价值,水作为与人类共存关系的对象,它不是一个我们赋予其权利的简单的客体,它本身具有生态中心主义者常说的“内在价值”。水作为一个伦理主体,一个生命体,有着其生长、发展、成熟乃至消亡的需要,它的流量和存量是生命的根本,它的自由是天性。人不能对水只有权利,没有义务,水对人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从我国水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只要人水和谐相处,文化就能获得生命力,如若人水不能和谐相处,则必将引发环境和社会问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河流、湖泊都不是我们的保护对象,在和人类文化的共生中它们具有“道德顾客”身份,因而,和谐的关系是一种交往的需要,道德的必然,是最根本的文化价值。

三、人水和谐应该体现在水祀活动和水利活动两个方面

我国对水祀活动的记载有着悠久的历史。《尚书·盘庚》记载了盘庚在为避免水患、复兴殷商的祭祀活动中告诫臣民的教诲。他痛陈利害:“惟涉河以民迁”,才能“安定厥邦”。古代社会的许多水祀活动起初是由于人们惧怕洪水带来灾害,后来则更多地体现了人们掌握了洪水规律能够在灾难中驾驭生活的自信。如西门豹治邺的故事,将巫婆顶替少女投给漳河之神河伯,体现了人们对水灾害思想认识的转变,人们开始有信心战胜洪水、治理洪水,使洪水和人们的生活不是处于紧张之中,而是处于和谐之中。在漫长的历史中,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风俗习惯、宗教习俗很多与水、与河流湖泊联系在一起,在水祀活动中流传下来。例如,端午节(汉族,古时的主要礼俗是蓄兰沐浴)、泼水节(傣族、阿昌族)、沐浴节(藏族)、背吉祥水(藏族)、杀鱼节(苗族)、汲新水(壮族)、春水节(白族)、澡堂会(傈僳族)等,这些民族习俗在一个人水和谐的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在祭水中体现着敬水,在戏水中体现着亲水、爱水;每当节日来临之际,澄净、祥和的气氛给人们带来了欢乐,带来了文化盛宴。

然而,在今天,这样的活动日见式微,水祀活动在频繁的水匮乏、水危机、水污染、水纠纷面前带给

人们更多的是忧虑,是痛心。世界水日(每年3月22日)根本就不是一个欢庆人水和睦相处的节日,而是一个提醒人们水资源日益短缺,将来很可能导致国家之间冲突的祭日。人们一天不确立水作为生命主体的地位,不尊重水的自由品格,不尊重它赖以生存的基本存量、流量和承载力,那种大庇天下人民俱欢颜的日子就一天也不再出现。

更重要的是,要在水利活动中坚持人水和谐的理念。

水利活动主要是指治水和用水。中国古代的治水理论,真正高明的都体现人水和谐的思想。大禹采取“疏导”的方法治水,对于后世关于堵塞与疏导关系的认识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汉贾让治河三策中的“上策”是改道北流,体现了人与洪水和谐相处的思想;明代徐贞明说过:“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兴。”他反对一味伯鲦高筑,主张审时度势,穿漕清淤,引水分流。

在水利工程建设方面,人水和谐的案例也不胜枚举。例如,都江堰主体工程将岷江水流分成两条,其中一条水流引入成都平原,既可以分洪减灾,又达到了引水灌田、变害为利;李冰父子在飞沙堰的设计中很好地运用了回旋流的理论,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是水工设计中遵循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的典范。安徽歙县有座始建于宋的渔梁坝,它横截练江,使坝上水势平坦,坝下激流奔腾。它使上游之水可蓄,坝下之流能缓。无论灌溉、行舟、放筏、抗洪,都可兼而利之。这样的治水工程,不仅给后代留下了久远的社会效益,还形成了独特的景观文化与历史古迹。

新中国成立以来,共建成了各类大坝约8.6万余座,数量居世界首位。应该说,大规模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特别是大坝建设,在防洪、供水、灌溉、发电、水产养殖、改善环境、发展旅游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进步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7]但是,大坝建多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现代大坝的特点无一不是在改变某地区原生态基础上的蓄水、横断截流,由此造成的生态问题、湖河关系问题、泥沙问题、气候问题、地质问题、移民问题迟早会以各种形式困扰人们。大坝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清华大学张光斗院士说过,以前“我认为采取工程措施,修堤防,建水库,人定胜天,能根治水害……现在真正认识到,根治洪灾是不现实的,必须学会与洪水协调共处。”^[8]

就用水而言,农业社会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人口的增长,而人对于水的使用和开发过度,会带来灾难

性后果。古代中国一些湖泊的消失或面积缩小,如雷夏、圃田泽、彭蠡、大野等,人口干扰的因素是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在工业社会,由于对经济增长和利益的贪婪追求,用水极度增长,对水的破坏性开发和利用带来了严重的水浪费、水污染,直至水资源严重短缺。就我国来说,水资源财富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呈下降趋势。污染的加剧,使本来就有限的水资源供求矛盾更加尖锐,掠夺性的开发造成严重的后果。以湖泊为例,由于盲目围垦,过度利用水资源,导致湖泊面积减少甚至消亡。中国每年平均有20个天然湖泊在消亡,1949年以来已经减少了1000个左右的内陆湖泊。长江中下游地区,湖泊面积由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17198 km²,减少到现在的不足6600 km²,即三分之二以上的湖泊面积消亡。因为围垦,洞庭湖的面积已由1949年的4350 km²急剧缩小至2625 km²;鄱阳湖的面积也由1949年的5200 km²减少到目前的2933 km²。三峡工程运行降低了鄱阳湖的枯水位,降低了鄱阳湖的调蓄容积和有效调蓄作用,对湖区航运、水产、水质、生态环境以及沿湖地区的工农业用水、居民生活供水等均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9]。

更糟糕的是,工业造成的水污染加重了水质性水资源短缺问题。江河湖泊不再像奔腾的狂放的少年,而像是被岁月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老人;天何言哉,当一个生命得不到尊重时,当它只被索取时,它就会有自己的反叛与报复。事实上,全国水环境恶化的趋势还在继续。2006年,全国地表水总体水质属中度污染,国家地表水监测断面中,1~3类、4~5类和劣5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40%、32%和28%。辽河、海河为重度污染,一些河道丧失了使用功能,重点湖泊水质仍在下降,太湖和滇池水质为劣5类,巢湖为5类^[10]。

所以,将人水和谐的思想贯彻在用水上十分紧迫。原水利部部长、华东水利学院第一任院长钱正英院士曾直言,过去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只注重社会经济用水,没认识到首先需保证河流的生态与环境需水。”^[11]用水必须和关于水资源承载力的科学认识结合起来。用水不仅要看所用河流、湖泊的水量、水质,还要考虑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的生态环境需水机制,包括需水的时空分布特征、水循环过程等,从可持续发展角度限制人类的需求。在物欲亢进的世界,只有洗涤自己的心灵,才会发现水作为生命体的真实存在,才会真正追求人水和谐的文化价值。

(下转第29页)

的伟大实践,正是求实精神的集中体现。

求实精神首先体现在将治水方略、水利工程设计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水利事业的成功。禹的父亲鲧面对黄河洪灾,没有经过很好的调查研究,只是简单沿用了先人共工氏“壅防百川,堕高堙堦”的方法,想通过单纯的防御抵抗洪水,但由于洪水的巨大冲击力,堤坝屡被冲毁。9年过去了,鲧耗费了无数人力、物力,洪水却依然肆虐。后来大禹完成了父亲的未竟之业。《史记·夏本纪》说禹“左准绳,右规矩”,“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也就是说,大禹经常带着测量工具,到各地勘察地形,测量水势。在艰苦而充分的实地勘察的基础上,大禹对父亲的治水策略进行了反思,他意识到“水有自然流势,只能因势利导”,于是变壅防为疏导。经过13年兢兢业业、含辛茹苦的奋斗,终于赢得了治水事业的巨大成功。为了修建都江堰工程,李冰父子对岷江两岸多次进行实地考察,他们沿岷江逆流而上,行程数百里,亲自勘察岷江的水情、地势。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李冰确定了治理岷江的周密方案。在经过一些试验后,都江堰工程终于建成,它经受住了2000多年的考验,堪称水利史上的经典。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为了疏浚汴渠,亲自测量了汴渠下游从开封到泗州淮河岸共八百四十里河段的地势,以“分层筑堰法”测得开封和泗州之间地势高度相差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可以说,历代水利名人无不高度重视调查研究。

求实精神还体现在将治水方略、水利工程设计

建立在全局筹划的基础上。具有整体性的战略眼光,从全局出发,统筹规划,才能使水利实践活动事半功倍。早在2200多年前,名将白起所修建的白起渠就曾以一渠穿五陂,灌溉了大片农田,长渠能够充分发挥各陂塘的调蓄作用,提高整个渠系的灌溉能力。由于蛮河水不断补给陂塘,各陂塘之间又可以互相调剂,从而克服了孤塘独陂水源得不到保证的困难,在成功解决了蓄水面积、陂塘容积和灌溉面积之间不平衡状况的同时,有效增强了灌区的抗洪能力,由此可见整体性战略眼光给水利工程带来的巨大创新。西汉时期的贾让曾提出“治河三策”,其上策是人工改河,并在河畔低洼地区围堤成泽,用作河道的滞洪区。这种策略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治河方案,而是将黄河的许多河段通盘考察,进行整体性的规划,从而在治河时化被动为主动。东汉时期的王景更是将治河与治汴联系起来,表里结合,标本兼治,使治河获得了成功。他认为“河为汴害之源,汴为河害之表,河、汴分流,则运道无患,河、汴兼治,则得宜无穷。”其他像明代周用的“沟洫治黄”、潘季驯的“束水攻沙”等治河策略,均注重事物之间的联系,将多种因素通盘筹划,体现出可贵的求实精神。

参考文献:

- [1] 郑大俊.水文化研究与水文化教育须双轮驱动[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1-3.
- [2] 钱自立.“河海精神”的内涵与弘扬[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85-88.

(上接第22页)

参考文献:

- [1] 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63.
- [2]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2-4.
- [3] 泰勒.劳特利奇哲学史(第一卷)[M].韩东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1.
- [4] 方立天.佛教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101.
- [5] 李宗新.水文化的功能及加强水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DB/OL].[2007-05-21].http://www.waterculture.cn.

- [6] 钱穆.水利与水害[C]//古史地理论丛.北京:三联书店,2004.
- [7] 汪恕诚.中国大坝建设的成就和展望[DB/OL].[2000-09-04].http://www.hwcc.com.cn.
- [8] 张光斗.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的新认识[DB/OL].[2001-08-19].http://www.jswater.gov.cn.
- [9] 李世杰.中国湖泊的变迁[DB/OL].[2007-07-27].http://www.sina.com.cn.
- [10] 孙秀艳.我国每年消失20个天然湖泊50年减少1千个[DB/OL].[2007-07-12].http://www.people.com.cn.
- [11] 钱正英.水利界应反思中国河流开发[N].北京:科学时报,2005-12-06(1).